

← (上接3版)

所不同的是,留学德国、又曾受业于胡适的傅氏复将此一论点激进化,进而申论“史料的优先性”,成就其“史科学即史学”的看法。因此,在学理上傅斯年便直截了当地概称:“史学便是史科学。”因他认为:

凡能直接研究材料,便进步。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,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,便退步。(同上)

依此,傅氏且分辨“科学研究”与过去“学院学究的研究”的差异,遂创立了中国第一个专业史学的研究机构:“历史语言研究所”。无怪在西方史家中,傅氏特别推崇兰克(软克)与莫母森(Theodor Mommsen,1817—1903)的史学成就;至于中国史学,他则看重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,史料应用方面,他固贬抑欧阳修《五代史》,另一方面却高度称誉欧阳氏的《集古录》乃是“下手研究直接材料,是近代史学的真功夫”。其故无他,在于迎合西方史学所要求的史料考订水平而已。

以上所述恰好解开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谜团:新史学的倡导者既是摒弃固有史学,何以又对传统的考史工夫赞赏有加?此一情结不止见于傅氏一人,梁启超、胡适之辈亦复如此。例如他们虽蔑视《资治通鉴》所蕴含的史观,却独对司马光的史考交口称誉,代表考史工作的极致——清代考据学更受到一致的推崇。唯一不同的是,考证工作受到西方史学的冲击,必须重新对焦:传统经典已不是最后诉求的权威,史料与事实的关联方构成新史学关怀的焦点。这就是傅斯年所坚持的“如果抱着‘载籍极博犹考信于文艺’的观念,至多可以做到一个崔述,断断乎做不到一个近代史学者”(《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》)的正解。

* * *

概言之,梁启超、王国维、傅斯年三位均有丰富穿梭异文化的体验,因此除了详读其中文著作之外,必须深临其境,知悉其所领略的异文化,方得完整掌握其思想的原貌。复得点出地,了解“彼方”固不可缺,但细嚼作者中文原著仍是必经的途径,盖异文化浩瀚如汪洋,茫无边际,而造访者恒囿于先入为主的关怀,只能“弱水三千,只取一瓢”。是故,造访者留存的中文著作乃是不可或缺的指引线索。

(作者为台湾“中研院”史语所特聘研究员)



朱维铮
(1936—2012)

2012年3月10日下午3时52分,我个人向所欣赏的朱维铮教授不幸逝世。闻讯后打电话给朱夫人王先生,话未出口,已彼此泣下。维铮年仅七十有六岁,正值学问的盛年,不知有多少未竟的课业,尚待他宵衣旰食以付。他走得太早了。如果不是长期溺嗜烟酒,悲剧应不致发生。但若离斯二载,也就少了维铮特有的豪气。天地有大美,惟难得其全耳,奈何奈何!人生一如艺术,总在这里那里留下遗憾。当十年前我卧病的时候,因思念老友而不时出现维铮先生在学术会议上醉酒战群儒的场面,不禁为之慰藉而喜。他的雄睨多士的意气,他的与乡愿决绝的率性与直声,大家将永远记得。谨成一联以志哀:

博通经史,雄睨多士,微言从此失诤友;

坐阅古今,使气命诗,率性常留遍学林。

我与维铮相识于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卧佛寺会议,海内外众多学者参加了此次盛会。有几位是以前不熟悉的,有幸这次得以结识。香港来的陈方正先生、霍韬晦先生,都是此次一见如故,日后并成为好友。韬晦兄与我性情相投,会上我提出应在小学教育中增添《论语》和《诗经》诵读,他特地发言回应我的想法。朱维铮则是我向他征询对《中国文化》创刊的意见,并向他约稿。他看了创刊词和第一期要目,对刊物的宗旨表示认可——这是我们的初识,后来的交集便多了起来。

第二年,即1990年的秋天,他来北京出席冯友兰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,我也在会上,我们相约到我家一叙。内子也很高兴他的到来。维铮是无

思念朱维铮先生

刘梦溪

“他的冷峻的语言风格,容易让读者以为他只有了解,没有同情。清儒‘实事求是,无证不信’的信条,他奉为圭臬,但钱晓徵告白于海内的‘实事求是,护惜古人之苦心’,亦即前贤往圣著笔立说的不得不如是的苦心孤诣,我们的维铮似尚缺乏‘了解之同情’。”

锡人,但久居沪上,他们谈起上海的新旧风物,不乏共同语言。我则是第一次与维铮畅谈学术和思想,他的臧否人物的直言不讳令我感到惊喜。他的老师周予同主编的《历史文选》,是我为学很受益的书,不料维铮竟是此书编选注释的与有力者。他的学问根底的扎实应与此有关。然后是1991年9月,我以《中国文化》编辑部的名义,在上海召集学术座谈会,上海各方面的文史专家和著名学者20余人与会,有谭其骧、顾廷龙、蔡尚思、苏渊雷、冯契、贾植芳、王元化、钱伯城、王运熙、章培恒、朱维铮、汤志钧、唐振常、黄裳、邓云乡等。大家围绕《中国文化》的办刊宗旨及如何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,展开热烈讨论。维铮主要就学风问题发言,他说:“历史首先要问是什么?然后再问为什么。”“学风不正,学术成果必然打折扣。”他建议《中国文化》不妨讨论一下“经世致用”问题。这个话题正与我的思考相合。

这时,我主持的《中国现代学术经典》丛书计划已经开始。选目和编例的初稿曾送请部分师友承教。张舜徽先生、程千帆先生、汤一介先生、汪荣祖先生等都有以教我。朱维铮先生的回示有三页纸之多,同意丛书的大体设计,只是提醒我对拟选的五十家尚需再酌。他说:“麻烦主要不在哪些人已经入选,而在于哪些人没有入选。”并具列宋恕、张謇、汤寿潜、孙诒让、杜亚泉、辜鸿铭、黄远庸、易白沙、陈独秀、吴虞、李大钊、丁文江、孟森、梅光迪、柳一微、陈序经、吴稚晖、陶希圣等人的名字,认为杨文会、顾颉刚既可选,则这些人也似可以考虑。他是启发我选政之难,非欲强加也。《康有为卷》的编校之责,我请他来担承,他同意了。请他做丛书的编委,他未克即允,过了一些时日,他才应承下来。

他是个忙人,一次因催稿,发生了不愉快。按丛书编例,每一卷卷前例有入选人物的小传,字数在三至五千之间。但维铮告诉我,他的康传写了两万字。请他压缩,他拒绝。

为此我们在电话中几乎伤了和气。内子看到我声音很大地与内人理论,以为是和一个学生讲话。待知道是朱维铮,她深怪我不该如此。我已经做好了康卷换人的准备。不料三天之后接到他的来示,云“前夜得尊电,由康有为小传事,蒙申斥”,语词措意,令我忍俊不禁。然后说编委他不当了。然后说康传最好由我来作,以“垂范后世”。但随后却寄来了他的经压缩的康传改稿,并说:“虽又贻迟误之罪,然终属亡羊补牢,略胜有劳先生掷还再议之烦扰也。”而当丛书出版之后,他收到三十卷样书,于1998年2月12日写信给我,说:

已得三十卷,即用半夜逐册翻阅目录和年表、要目,粗得印象,以为总体符合学术性要求,选编也各有特色,虽说见仁见智,所收未必合乎尊序所示经典品格的要求,而均有参考价值,则可断言。此乃主编之成功,当贺。

晚清人物及近代学术思想是维铮先生的学术强项,能得到他的认可,殊非易易。他还对丛书的销售方法提出意见:“据有的学生说,已见全书在几家书店上架,但不拆零出售,只能望书兴叹。我不知是出版社批发规定,还是书店自作主张?但这类书的主要读者群,在文科的研究生和大学生。尚可零购,则各卷都有忍痛掏钱者。倘只能选择‘全或无’,则绝大多数必选‘无’也。即如拙编一卷,定价五十五元,要我自行购置,也需一思。况且诸卷所收,多半都有单行本,读者单为补己藏所缺的几种或数文,而要购置全卷,必多踌躇,而不拆零,更无疑拒绝主要读者。如此‘生意经’,当为出版者所知。”我即刻将此意转告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王亚民兄,后改为拆零销售,盖出于维铮先生的“生意经”也。

回顾《经典》丛书编纂过程我与维铮之间的曲折故事,没法不让人感到他的可爱。这一层,我在《中国现代学术要略》一书的后记中有所记述,我称他“不愧为学之诤友而士之君子”。我和维铮之间,可以说因丛书而最后订交。我的《要略》一书,200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,

当我寄请他指正时,很快收到他一信,原信不长,兹抄录如次。

梦溪先生:惠赐大著中国现代学术要略,穷宵读竟,甚感兴味。承不弃,于后记指名规过,感激。附录一读后,尤感恍然。十年前高会尊府诸贤,时已泰半耆艾,而今李慎之先生西去已久,内列名者半数长于弟,所谓耄耋矣。揆诸十年来人文学界,似无长进,乱象益甚。故而弟读尊府高会纪要,几感时空倒置,未知如今学界少年新锐,从中得有得乎?弟虽不幸,已与孔夫子不再梦周公齐年,然顽劣依旧,偶陈宿见,辄遭网民痛斥。因而尤佩先生雍容气度,欲学无方也。弟照例匆忙,近日除上课外,即困于学习诸生论文。前承先生电命为中国文化撰稿,受宠若惊,然温食需视作大患,仲夏前实不克作文求教,千乞鉴谅。勿此奉达,顺颂

文祉。

弟 维铮 08年三月一夜

此信最能见出朱维铮的学者风度。他有锋芒,有脾气,但为人学尊重事实,讲求明理。所谓“高会”,是指1998年2月16日,我并邀集戴逸、汤一介、李泽厚、庞朴、余敦康、王俊义、雷颐、梁治平等师友,在我家里对丛书总序所作的一次学术恳谈。拿到我的赠书,竟用一个晚上读完,这在一般人也是做不到的。对后记所记述的我们之间的故事,他说:“承不弃,于后记指名规过,感激。”词语中流露的雅然之趣,让我感到敬佩。至于信中以“雍容气度”许我,就不免愧不敢当了。

维铮这封信写于2008年3月1日,同年的11月3日,我们就在杭州的马一浮研讨会上见面了。头一天在杭州开幕,我以《马一浮的文化典范意义》为题作了主旨发言。第二天移师上虞继续开会。开幕式维铮没有出席,上虞的会他则按部就班地坐在那里。当人大国学院一位先生发言的时候,维铮打断了他,认为他讲的关于马先生的史事有出入。此次会议的参加者,大都是哲学史或儒学研究领域的学人,